

故土创伤与西方魅惑 ——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八十年代”

池雷鸣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故土创伤——西方憧憬”是隐匿于新移民文学,特别是在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有关“八十年代”的写作之中的双向性情感、叙事结构。这与弥漫在新移民文学中的浓郁创伤情愫紧密相关。新移民作家所表述的“故土创伤”,虽有集体式公共创伤和个体式内心创伤两种类型之分,但都成了新移民远离故土,走向西方的情感动力。通过不断地重返“八十年代”,新移民作家逐渐揭示出,昔日的“西方憧憬”,一方面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匮乏有关,同时又离不开隐匿于历史深处的“中弱西强”的“东西方语境”及其权力场域。基于此,“故土”上的“西方”才得以不断“魅化”,乃至“神化”。尽管新移民文学的“八十年代”与新时期文学具有某种同一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应该在“重返八十年代”之中被“同一”所遮蔽和遗忘。

关键词:新移民文学;加拿大“八十年代”;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5-0080-09

Homeland Trauma and Longing for the West ——On the “1980s” in Chinese Novels by New Immigrants in Canada

CHI Lei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Homeland trauma——longing for the West” is a bidirectional emotion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hidden in the new immigrants’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in the Canadian new immigrants’ Chinese novels about the “1980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ong traumatic sentiment pervading the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Although there are two types of “homeland trauma”——collective public trauma and individual internal trauma described by the new immigrant writers, they all become the emotional motiv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to leave their homeland and move forward to the West. By constantly returning to the “1980s”, new immigrant writers gradually reveal that the “longing for the West” in the past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and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trong Western power in the history. Based on this, the “West” in the “homeland” can be continuously “enchanted” and even “deified”. Although the “1980s” of the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has a certain identity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hould not be obscured and forgotten by “identity” in the “returning to the 1980s”.

Key words: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Canada “1980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收稿日期:2019-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留英美中国人英语文学与‘东学西渐’”(编号:17CZW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池雷鸣(1984-),男,河南虞城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华文文学。

一、作为“新移民文学”“源点”的“八十年代”

今天,新移民文学,即便从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滥觞——苏炜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小说《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开始算起,也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而且,自21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正蓬勃发展,已呈星火燎原之势,涌现出以严歌苓、张翎、陈河、虹影、曾晓文等一批实力派作家。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足以容得下一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了,是时候对其进行历史“重返”了。

“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虽然具有特定的区域、题材、语言的阈限性,但也足以提供一个窗口,让我们一起窥探新移民文学的历史境遇和诗生态。通过对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整体考察,特别是将其置放于百年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视野和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之下,可以发现,新移民文学总是弥漫着一种创伤性的情愫来描述离散者与故土之间的离别,而且这种创伤情愫,大多是由于特定的中国语境,比如历史创伤记忆、物质贫乏、谋求高速经济发展、贪腐等社会顽疾等所造成的精神、生态、物资、生活等生存困境。同时,与这种创伤情愫相映照的是一种面向西方的憧憬,仿佛故土的创伤,总是能在新居之地得以抚慰。这种“故土创伤——西方憧憬”的双向情感结构,就隐匿在新移民文学之中。^①当然,随着时空的转换,特别是作家个体离散体验的与日俱增,在创作上的不断开拓,特别是对自身经历的逐渐距离化与陌生化,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将涵盖这种结构,但“新移民文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就是说,每当审视它的时候,都需要进入历史的深处,去探求历史的源点。

说起故土经验中的创伤情愫和西方憧憬,应该从新移民的源点开始,那个令人怀念,不断重返的20世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在张旭东、查建英等人的推动下,从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就具有了社会集体性怀旧的情感、文化氛围;随后,在洪子诚、程光炜、王尧等学者的关切中,又成了一个学术史的增长点,甚至升华到方法论的层面。可以说,作为社会、文化、文学现象的“八十年代”,已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意味,而且具有某种原生性的年代。若想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一代人的代际经验与视野,“八十年代”既是一个源点,也是一种方法。对在特定历史时期兴起的新移民现象^②而言,这个被众人怀旧与关切的“八十年代”,更是具有被回溯和发掘的必要性。

实际上,加拿大新移民作家,有关“八十年代”的写作一直未曾中断,较早的有李彦的《红浮萍》、^③阎真的《曾在天涯》、原志的《不一样的天空》等,新近的有李彦的《吕梁箫声》、张翎的《阵痛》等。这些文本与之的关联,或许是故事时间的延伸点,比如《红浮萍》《阵痛》的“八十年代”仅是长达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的末端;或许是故事时间的起点,比如《曾在天涯》《不一样的天空》;或许仅是整个故事情节的一小段回忆的插曲而已,比如陈河的《红白黑》《在暗夜中欢笑》;当然,也有一些是以“八十年代”为主要的叙事语境的,如《吕梁箫声》等。无论“八十年代”在这些文本中具体的表现形态为何,都将是小说人物出国时的社会语境,成为他们离散之际故土经验的终结点。

事实上,在我们所掌握的新移民作家里,由于当时加拿大移民政策的限制,除了阿木(刘慧琴)等少数几个,以亲属移民的形式,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移居到加拿大,张翎、李彦、原志、阎真等较早的一批作家,都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以留学(包含陪读)的形式移居到加拿大。可以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八十年代”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回忆者、记录者,甚至如李彦、原志等作家还是那个时代的写作者。所以,无论从作家个体而言,还是从文本而言,“八十年代”对加拿大的新移民文学也同样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而且还有方法论的意义。

毋庸置疑,“八十年代”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有着极为独特的意义。相对于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九十年代以后市场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唯独“八十年代”是一个敢与“五四”时期相媲美的充满“救亡”与“启蒙”人文精神的,或者如甘阳所言,是“最后的‘文化人’”^{[1][p4]}的时代。可能正由于此,它在查建英看来,才充满浪漫的激情;^{[2][p3]}在陈平原看来,才值得怀念。^{[2][p129]}当我们也沉醉在怀旧的浪漫氛围里,去看待加拿大新移民小说中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却发现了一直萦绕其中的,已历时三十年之久的创伤情愫。

二、历史创伤的两种类型与走向“西方”

(一) 集体式公共创伤

在一次访谈里,赵庆庆曾将李彦的《红浮萍》与“伤痕文学”相比对,并将其称为“‘伤痕文学’在中国境外的延伸和演

① 除“故土创伤——西方憧憬”的结构之外,还存有与之相对照的另一情感性结构,即“新居残缺——故土召唤”。有关后者的阐述,请参考池雷鸣《新居残缺与故土召唤: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

② 虽然中国大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实在1973年就开始了,甚至从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陆续有少数人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偷渡、亲属移民、移居国外,但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还应该从“八十年代”算起。

③ 李彦的《红浮萍》虽然2010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但其英文版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却在1988年左右就开始创作,并于1995年在加拿大出版。

变”。^{[3] [p677]} 这种比较的认知,正是基于《红浮萍》本身所流露出的创伤情愫。《红浮萍》在一个三代的家族框架内,填塞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十九岁的外婆,待嫁闺中,却追随着“一个身材魁梧、骑高头大马的军官”^{[4] [p15]} 的目光,开启了一段浪漫的革命爱情;青年时代的母亲雯,为了失去的青年教师的爱情,转身在革命中谱写另一种有着“异曲同工”的“神的大爱”。^{[4] [p45]} 可是,外婆和母亲的青春憧憬,都在沧桑中慢慢凋零,并造成婚姻破裂、亲情残缺的“人”的困境。与之相较,在特定历史时期里成长的“我”,不但没有外婆和母亲那种青春的浪漫记忆,反而只有在成长中所留下的,对人的爱情、亲情、友情、身体、理想等全部剥夺的创伤记忆。于是,“我羡慕母亲、也羡慕外婆。我的青春,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未曾开过一朵小花,也未曾诞生过魂牵梦萦的思念”。^{[4] [p315]} 雅克·勒高夫曾说过:“过去的意义就在于启迪现在。”^{[5] [p7]} 但当记忆中的一切,只是“一片荒芜的原野”的时候,又如何依靠过去启迪与诠释现在呢?据此,可以感知,“我”过去青春的荒芜即是现在的荒芜。这种意义的无所依附感,已令“我”陷入了查尔斯·泰勒所指的人的根本性现代困境^①之中。

在川沙的《阳光》中,秦田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创伤记忆及茫然无措的现状困境。与李彦通过聚焦情感的零落,来表述荒芜的创伤情愫不同的是,川沙更加关注暴力和杀戮,其表现形式既呈现在小说的章节安排上,又体现在故事情节之中。《阳光》共计50章,其中25章与现实情境有关,25章与历史记忆有关。在历史记忆的章节里,有12章与杀戮和死亡场景有关。虽说《红浮萍》也在历史记忆中采用人物的成长视角,但《阳光》更像是带了一副有色滤镜,让秦田在成长视角中偏向于“血……血……血……”(第19章的题名),而且还通过他的倾听(比如第34章“老刺客看新刺客行刺”)与阅读(比如第27章“一九四二济南锄奸事件”)对暴力给予历史的追溯。

《阳光》的历史记忆是在秦田的成长视角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意味着暴力是秦田记忆中的核心因素。令人意外的是,在现实情境中,对暴力历史进行反思的秦田,不仅不能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反而重蹈覆辙,甚至将此实践化、行动化。在历史记忆中中断的三章里(第30、31、32章),回国探亲的秦田以保护瑛子为契机,与张拜、杜林、邓虎等一起对昔日的造反派头目的儿子薛李,进行“私设公堂”(第32章题名),割掉了他的三个手指头和两只耳朵。这种恨与报复的意识是暴力历史的延续,更是暴力思维的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在《社会记忆》一文中说:“过去的许多方面,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决定;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这种传递一直延续到儿孙们的神经处理过程的生物化学中去;过去未能如愿的未来希望,可能会突然和出人意料地具有行为指导作用和历史威力。”对秦田等人而言,历史传承的并非“过去未能如愿的未来希望”,而是过去一直如愿的未来失望。尽管秦田以其高级知识分子的理性,洞察了历史中的暴力因素,并且理解基督教爱的理念,但仍然无法抗拒历史暴力的思维与准则突如其来的“指导作用和历史威力”。^{[6] [p3]} 于是,他也同样不得不陷入人的根本性困境之中。

尽管《红浮萍》和《阳光》对历史认知的表征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展现了历史与现在之间的某种一致性:荒芜——荒芜,暴力思维——暴力思维,以及那宿命般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境。虽然,在具体文本的表征里,是以个体的形式去承载历史的重负,但由于“荒芜的原野”“暴力历史的追问”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让“我”和秦田的创伤情愫,如同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伤痕文学”那样,能够浸入到社会和大众的心灵里。

与此类社会的历史言说和公共的创伤体验不同,在陈河的《布偶》和张翎的《雁过藻溪》里,还存有另一种言说和体验方式,即个体的内心私语。

(二) 个体式内心创伤

在《雁过藻溪》中,最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即母亲和末雁在那个特定历史年代里所遭遇的强奸。实际上,“强奸”在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创伤书写里,是较为频繁的事件,比如李彦的《杏树岭》、川沙的《阳光》、陈河的《布偶》等,但《雁过藻溪》在表述事件时,具有自己的文本特色。

李彦的《杏树岭》和《红浮萍》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文本关联,或者说是一种互文性的文本移植关系^②。《杏树岭》实际上是《红浮萍》故事情节中的一个分支,对它的解读,离不开长篇小说所涵盖的时代语境,但并不意味着,《杏树岭》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叙事重复。其中,与桃子相关的“强奸”事件,就是“重复”的价值之一:再现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集体失语的处境和动因。

与《杏树岭》重在强奸后的处置情境不同,《阳光》通过秦田的双眼,以内视角的形式,虽然也回避直击强奸场景,但通过内外描写相结合的形式(一方面详尽描摹受害人外貌,一方面又尽情渲染秦田与日俱增的恐惧感觉)尽可能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进而在虚实之间还原受害者遭受强奸时的真实情境。这种肉体蹂躏真实性的营造,造成极强的视觉、心理冲击力,进而带来惨不忍睹的沉重阅读体验。其叙事效果之一,即在于渲染暴力思维所造成的惨无人道的恶果。

① 查尔斯·泰勒曾说:“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出现的问题是类似的,即什么使人的生活值得过,或者什么赋予他们的个体生活以意义。为了回答这里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仍旧处在摸索过程中。这就是根本性的现代困境”。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霞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② 晏宇在对张翎小说研究里发现了一种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的文本移植现象,并以《羊》和《邮购新娘》之间的文本关联为例,称之为“互文性”叙事。参见晏宇《张翎小说异族婚恋叙事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与之相较,《雁过藻溪》至少有两点不同之处。在前两个小说文本中,主要人物并非“强奸”的亲历者,只是旁观者和看客。在《雁过藻溪》中,母亲信月和小改(即末雁),无论是在故事情节中,还是在文本意义生成里,都是主要人物,承载着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而“强奸”的遭遇及其影响,是她们各自人生中的核心事件之一,也是整个文本语境中的关键叙事因素之一。正是由于这种主要人物的亲历性,致使“强奸”在人物叙事层面一直处于被塞藏状态中。小改的“塞藏”呈现在自己一直以来的记忆质问与自责里——“其实,那天,在姚桥,你完全可以用力一些,再用力一些,推开那个姓刘的。你为什么没有一头撞到墙上?……事情的结局是否就会全然不同了?”^{[7] (p55-56)} 信月的“塞藏”是通过末雁(即小改)对母亲历史的追寻得以揭示的——“母亲的所有真性情,都被一个硕大无比的秘密,碾压成一片薄而坚硬的沉寂”。^{[7] (p126)} 这种“塞藏”是一种无声的、个人化的面对方式和人生姿态,并呈现出秘密式的、私语化的表征形式。母亲和末雁强奸的人生遭遇及其“塞藏”的人生姿态,在整个文本语境里,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相似性,而是始于一种“母女重复模式”:历史(记忆)的创伤及其现在影响。

在创伤理论中,有一个“代际间幽灵”^①(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的说法。它强调隐秘的创伤在代际间传递以及对下一代幽灵般的影响。对于《雁过藻溪》的文本语境而言,“强奸”不再是《杏树岭》和《阳光》中的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了类似缩影、象征之类的意义,并且如幽灵一样存在于末雁的现实生活之中。在承认理论中,“强奸”是个体认同所遭遇的第一种蔑视形式(即“强暴”,包含虐待和强奸)中的一种。这种蔑视形式“是最根本的个人贬黜形式”,也“更加具有毁灭性”;其特殊性在于,它“所引起的并非纯粹是肉体的痛苦,而是一种与他人的淫威之下感到孤独无助、无法自卫相联系痛苦,以致个人在现实中感到失去了自我”。^{[8] (p141)} 也就意味着,信月和小改(即末雁)对“强奸”的私语式“塞藏”,是一种“失去自我”的表露,却不得不掩盖在历史的洪流和茫茫人生之中;即是说,母亲一生沉默寡言、对自己的女儿小改冷若冰霜,以及末雁的“闷”“一根筋”“没好奇心”等性格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病症,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创伤神经症”。弗洛伊德把创伤神经症的病因归因于“创伤发生之时的固着”,即病人“固着”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而无法摆脱,以至与现在和将来发生了脱节。^{[9] (p201)} 无疑,“强奸”就是信月和小改(末雁)的“固着”,而且是现实中无法面对的,因而不可能透露给他人的“固着”。因此,她们在现实的病症,实际上正是历史的病症,但她们因此所遭遇的痛苦,却只能是个人化的痛苦,无法向别人言说的私语式的痛苦。

《布偶》中也涉及“强奸”,却不是基于真实,而是被编织的虚假。莫丘和柯依丽之间的感情,尽管是青春的朦胧,却也是你情我愿,但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之下,二者情感的真实,却被标签为一个虚假的强奸事件,而莫丘却不得不为这个虚假担负了真实的牢狱之灾。七年之后(1981年),重获自由的莫丘,在一次对城西大教堂的重游中,偶然地获知了两个真相。一个是柯依丽曾挺着大肚子去青海寻访过他,虽然找错了对象,但她的行为,还是令莫丘大为感动,“他终于了解了柯依丽的心,知道了她来青海找过他,还因为这趟旅程导致她难产而死。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获得了真相,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将终身背上一个精神十字架了。”^{[10] (p246)} 这个真相,宣告了“强奸”的虚假,但还不足以揭示“被编织”的阴谋。

另一个真相,是有关裴达峰医生的。这个时候的裴达峰,虽然因“罪名是私设医院接生造成产妇死亡”,而在监狱服刑,但柯依丽的死亡,不仅没有损害他精神领袖的形象,反而还得以固化。这呈现在傅西科神父的回顾里,“裴医生被判刑让全厂人员哭泣了好几天。本来,裴医生在早些时候就可以前往德国的。他是为了给柯依丽接生,才推迟了行程。……裴达峰医生进了监狱之后,厂里的工友的情绪到了最低点,大家都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10] (p246)} 傅西科的言说意味着,裴达峰对自身精神领袖形象的有意识自我构建,不仅没有被揭穿,反而被继续埋藏于历史的深处,直至莫丘在无意之中洞察了他的真面目。

现在莫丘一切都明白了:在1974年初,裴达峰医生站在他现在所站的位置,开始制造了一起后来毁掉了他和柯依丽包括裴医生自己的阴谋。莫丘顿时大汗淋漓,比那时看见玻璃窗后的眼睛、看见那个雪白的布偶人还要恐惧十分。^{[10] (p248)}

但这个关于邪恶的裴达峰的真相,在其被历史固化的精神领袖形象面前,只能属于莫丘一个人的发现,与柯依丽的精神十字架一道,成为莫丘在二十多年游荡生活中的历史的负担。此刻,莫丘的发现,也同样具有不可言说的私语性。虽然,莫丘的“强奸”是一个虚假事件,后来也被真相还原,但也同样给莫丘带来了精神上的伤害。霍耐特曾说过:“拷打或强暴所造成的伤害常常伴随着个人对社会世界之可靠性的急剧衰退,常常伴随着个人基本自信的崩溃。”^{[8] (p142)} 莫丘可能正是由于过去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可靠性的衰退”,无法在所立足的社会世界中寻获到“个人基本自信”,于是才选择游荡。

游荡,意味着离开,至少在地理意义上,实现与过去(历史)有关联的社会世界的分离。莫丘的游荡,可以说是,新移

① 匈牙利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家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与托罗克(Maria Torok)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下生发出一种代际间幽灵理论。相关论点可参看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民在“八十年代”选择离开故土,离散他乡的缩影、象征和隐喻。

(三)走向“西方”

新移民有关“八十年代”的叙事和表征,与“伤痕文学”,甚至“新时期文学”的相通之处,在于那段难以释怀的历史创伤记忆,是各自写作的传统和得以阐释的语境。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很可能在于各自在写作中所透露的地理意识。有学者认为,作为“伤痕文学”重要起源的《班主任》讲述了一个有关“家”的故事——“从文革伦理向血缘和家庭伦理回归的故事”。^{[11] [p163]}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从起源处开始,对于特定历史时期这个写作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文学形式,都是立足于“重返”和“回归”。与之相反,新移民文学的立足点恰在于莫丘式的“离开”,如《红浮萍》也讲述了一个“文革伦理向血缘和家庭伦理回归的故事”,但它并没有在此驻留,而是又继续讲述了一个再次离开的故事。

新移民笔下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不得不“离开”故土的年代。无论是李彦、川沙所揭示的贯穿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荒芜与暴力思维,还是张翎和陈河所呈现的,难以启齿的,不可言说的历史创伤和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与面对的历史苦难;它们都一致地表明,新移民在“八十年代”的故土,无法逃脱那幽灵般的历史宿命,以至于不可能摆脱人的根本性困境和重获个人的基本自信。这可能是,“八十年代”在新移民的不同时期的写作中,都始终充满创伤情愫,而不是“充满青春激情”^{[1] [p3]}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创伤情愫,更多地属于与“八十年代”有关的那个具有创伤记忆的历史传统,而不是属于与“八十年代”相关的未来。正如《红浮萍》的“我”,在面对过去与现在的荒芜生存处境时,不再具有那种深深的历史无奈,而是与之相反,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幸运与乐观——“也算幸运,我仍然拥有年轻的生命,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探求、寻找”。^{[4] [p315]}这个面向苦难的微笑,属于“八十年代”的开放及其所展望的空间远景,却不属于故土。于是,“我”、秦田、小改、莫丘以及赋予他们生命的新移民作家都离开了故土,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西方。

三、西方的憧憬与文化自信的匮乏

为什么是西方?当他们走不出人的根本困境,无法建立人的基本信心,不得不默默地面对与承担历史苦难的时候,就认定故土令他们无法解脱,难道西方就可以带给他们想要的抚慰吗?

《曾在天涯》的高力伟,为了“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机会”,毅然放弃了做一名北京著名教授的博士生,而这个“机会”,就是到加拿大去。当高力伟轻而易举地拿到了签证的时候,“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一种巨大的力量逼近,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为了舒缓它,就得“再次品味那种令人昏眩的幸福”。于是,在火车上,我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厕所,“我门好了门,从内衣口袋里小心掏出护照翻到贴有签证标记的那一页,那黄色的小方卡给了一个伟大梦想的真正实现以权威的证明。我抚着那光滑的表面在列车隆隆声中哈哈大笑,把护照用嘴轻轻叼了,双手伸过头顶拼命地拍得‘叭叭’响。又呆看着拍得通红的双手晃着头微微地笑,嘴唇哆嗦着自言自语地吐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直到外面的人等得焦躁拼命捶门我才出来”。这看似癫狂的行为,却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下了火车,高力伟碰到了去北京签证,正着手去美国的朋友胡大鹏。他用直抖的双手捧着签证,告诉高力伟“这等于多活了一百年。”“这里一百年以后还不见得那么发达,那你马上就得到了,这可不是多活了一百年么?”^{[12] [p5-6]}

这种狂喜,虽然含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是一种艺术化的再现与聚焦,还是能够反映出“八十年代”的人们面向西方的姿态和心理。以此来看,离散和西方的关联,早在离散之前,在故土上,就已经真切地发生了,只不过不是面对面的,而是想象的。这是怎样的想象呢?高力伟说“尽管思文在信中告诉了我,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仍是天堂般的美妙。”^{[12] [p6]}这个西方,即天堂的想象性图景,建立在两种经验的忽视,甚至无视之上。

时空阻隔的空间经验。在“八十年代”,虽然西方的壁垒,逐渐开始被打破,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与深入,但对很多普通的民众而言,由于中西之间长时期地时空阻隔,西方仅仅是一个被言说的符号,其内涵是被他人填塞的,而不是主体自身面对面发现的。卡西尔曾说过“只有在我们与人类的直接交往中,我们才能洞察人的特性。要理解人,我们就必须在实际上面对着人,必须面对面地与人来往。”^{[13] [p8]}而且,在他的哲学里,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或者说人就是作为文化的符号,这就是人的特性。这样看来,对许多向往西方的人而言,他们的西方(西方人及其文化),由于缺少面对面的现场感,只能是一种隔岸看花。

2006年,在和查建英的一次对话中,李陀指出,“八十年代”有两个主要的思想运动,即“思想解放”和“新启蒙”。在他看来,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思想解放”是要“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而“新启蒙”则是“想凭借援引西入中,也就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14] [p90]}李陀从这个区分中,实际上指出了新时期文学的两个写作资源,一个是前面已指出的历史创伤记忆传统,另一个即是“西学”。如果说,第一个传统来自作家们的亲身经历,或者用卡西尔的话来说,即是面对面体验,那么,第二传统则是来自“翻译”。

查建英在对甘阳的访谈中指出“回顾八十年代的时候,一般认为有三大丛书:这个《文化:中国与世界》,还有《走向未来》和《中国文化书院》。”^{[2] [p196]}前者指由甘阳主编,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主编,始于1984年,终于1988年,偏重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人发起,1984年成立,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由商务印书馆,在1981年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2012年已出版发行共计十四辑。在“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四套丛书中,有三套的宗旨是翻译“西方”。这样简单的历史概览,实际上展现了“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特别是学术、思想上接触及其方式的真实情况。

通过翻译认知西方,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惯常方式。这些丛书的主编们,对此不仅心知肚明,而且是主动传承和实践。其中,“文库”的编者就曾经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中宣告“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①这种自觉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表明丛书的编者们对深入地了解“世界”(实际上是“西方”)的渴求,以及对“中国”“创造性大发展”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他们对沟通中西作为桥梁的“翻译”的重视与信赖。从编者们的言说中所透露的历史认同可以看出,他们跨过“历史创伤记忆传统”而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和“梁启超”的历史原点,并以此作为探寻东西方的关联点。实际上,正如甘阳所称——“八十年代”是最后一个“文化人的时代”中所透露的时间意识那样,以“新启蒙”为旗帜的“八十年代”,更愿意与“五四”,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发生血脉关联,其中就包含对于那个时期西方观的继承。

还是在那次访谈里,李陀讲了一个在一次“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的争论中,被逼问“你直说,别拐弯抹角,你赞成不赞成全盘西化!”的事。虽然李陀回忆说,由于那个学者热切的目光,自己才撒谎说“我赞成全盘西化”。但是还是感受到了那个学者言语“好,这我就放心了”)中的那种“热乎乎”的感动。^{[14] [p90]}这个例子虽然有些极端,但也足以表明“西方”“西化”在“八十年代”人文知识分子中巨大的魅力及影响力。

历史传承并不意味着要照搬与重复。借鉴西方、认同西方,甚至在历史中寻找支撑点,这些都给“八十年代”带来了人的再发现,精神的再启蒙,甚至新启蒙,由此真切地营造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别是在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危机社会语境的参照下,而这些都与“翻译”息息相关。但问题是,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五四”,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由于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二者之间盲目地,不加区分地比附,易导致历史的“异化”。在笔者看来,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其一就是“八十年代”之前曾经经历一段与西方文明的绝缘期,在这期间,“知识者在被隔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同时,实际也失去了与其话语的交流、磋商、接受并因此而建立自己言说的某种可能性”。^[15]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绝缘而导致的面向西方的失语处境,让“八十年代”的“翻译”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缺乏“五四”时期面对面体验西方的经历。

甘阳主编的“文库”,由于重在对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在1985年兴起的“文化热”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在策划、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文库”的绝大多数编者都还没有“进入西方”的个人经历,缺乏对西方国家面对面的了解和体验,以致在“文库”翻译对象的选择和译序中,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叙事。程光炜将此视为“存在主义”和各种“语言”理论在中国学术翻译中不断被重述、变形和为我所用的原因。^[16]如果我们将程光炜的看法,从学术、思想层面扩展至社会层面来看待的话,那么由于“隔岸看花”的时空限制,立于“本土的视点”的西方,只能是一个变形、叙事、想象的“西方”。

除了这种“翻译”的变形和误读之外,这朵花,还是被制作的人工之花。对此,有着与西方面对面体验的杜维明深有体会“我可以说,大多数东方的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对美国的报道,和实际的情形偏差很大。要真正了解美国这个社会是不大容易的。”^{[17] [p195]}被“制作”的西方或西方文化,由于特定时期时空的阻断,而呈现出极具理想色彩的美好。这种美好在两个层面被制作:一方面,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舆论战,被宣传成为自由与民主之地;另一方面,一定时期以来革命教育的引导,西方世界被视为敌人与罪恶之源。这种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在“改革”与“开放”本身所呈现的趋向中,逐渐瓦解,昔日的“敌人”与“罪人”发生了转变,“自由”与“民主”得以双向重塑。于是,在内与外两个维度上,西方被重新确立,成为美好的代名词。卡西尔说,“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根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13] [p16]}由西方人及其表征的文化构成的“西方”,正是缺少了这种矛盾性,只能是空洞的思辨,而非一个实在的概念。

由于这种认知的误区或者理性的误区,从历史非理性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又在面向西方的时候,重新陷入了非理性之中,于是,再次陷入正在批判的历史思维之中。所以,在思文面对面的西方体验(“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的参照下,高力伟依然忠于自己的想象,憧憬着那“天堂般的美妙”。这种对西方想象图景的自信,是盲目而疯狂

① 参见“文库”每册书的“首页”。

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高力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是疯了,却还是克制不住地那样去想,这种想象之固执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告知的事实扭转。”^{[12] p6}——但这种对西方的信念已然成为不可扭转的想象的固念。这就是荒诞的生存经验。又考虑到高力伟等人物的人文知识分子、作家身份,这种人物设置本身,就是对那个“最后的文化人时代”极大的讽刺,令人不禁想起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高大鹏关于“多活一百年”解释里,实际上存有一个中西对照的结构模式,即“中=落后,西=发达”。基于此,一切荒诞都是合理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冷战的全球背景下,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优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民族自信心,但在历史创伤记忆对个体自信的摧残、“八十年代”急遽地敌我反转和历史传统的回溯中,靠政治激情堆砌的民族自信,瞬间崩溃,甚至对一些人而言,已成虚无。因而,故土,对高力伟等即将离开、准备离开的人而言,虽有情感、血脉的牵扯,但在西方“朝阳无限好”的憧憬中,也只能有心无力。

这个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由于东西方在现代性方面的历史差距,存在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才能激励国人学习和借鉴西方,但在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自信自“天朝上国”心态崩溃之后,似乎至今还未得以合理的重建,以致在“中西古今”的相互参照下,中国的、传统的,一直处于西方和现代的压制之中,而“全盘西化”思想和媚西心理,却一度甚嚣尘上。高大鹏所言的,“这里一百年也不见得那么发达”,正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自我矮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

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民族心态上而言,高力伟离散前的心态,可视为一个群体的隐喻和寓言,在加拿大新移民文学中,具有极大的概括性。

陈河在欧洲题材的写作中,围绕着秋涓《红白黑》、柳银犁《在暗笑中欢笑》等重点人物的塑造,对福建、温州等地区的偷渡群体进行了集体呈现,其中就揭示了在故土贫困等物质匮乏与西方富饶的强烈对比下,物欲对千难万险的偷渡行为的激励。曾晓文的《白日飘行》《遣送》《中国妻子的日记》等小说、贾葆衡的《移民梦》等也对偷渡这种非法的移民形式进行了类似的关切与揭示。

笑言的《没有影子的行走》、尧尧的《你来,我走》对技术移民群体进行了专门地聚焦。由于加拿大等主要移民国家移民政策的调整,技术移民成为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主要移民形式。他们与八十年代的留学移民相比,创伤情愫在时间的过滤下稀释了不少,与偷渡移民相比,不仅衣食无忧,事业良好,还可以如《没有影子的行走》中的曹嘉文那样,“贴身藏着三万美元现金”,但这些依然阻挡不了他们离开故土,走向西方。

从孙博的《小学生泪洒异国》、曾晓文的《移民岁月》、陈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女孩与三文鱼》等与小留学生相关的文本来看,由于社会性西方憧憬的氛围,西方的诱惑自然涵盖了孩童,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长们。正是西方所暗示和象征的神奇般的美好眩晕,让家长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将下一代的未来寄托在西方的幻影中。这种寄托,不仅仅是“望子成龙”的伦理需求,隐匿其中的还有自身的欲望投射:禁不住的诱惑,自身没有选择权,就将其投射在下一代身上,并借此实现满足。

尽管历史的车轮终究要走出八十年代,向新的世纪迈进,但在新移民作家笔下,无论是哪个时期的非法偷渡、九十年代的技术移民、甚至21世纪的小留学生、投资移民等,都存有“故土创伤——西方憧憬”的叙事结构,并在结构隐匿者“自我矮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许,新移民作家有着不同的离散年代,离散形式,离散区域,甚至创伤体验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对历史创伤、物质贫乏等成长性创伤,以及与此对照的与西方相关的想象性图景,总会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历史重负中,成为一代人值得聚焦之所在,形成挥之不去的代际烙印,并沉淀在不同的文学表述之中,期待着被人辨别与发现。

四、魅惑的西方与隐匿的权力场域

正如尧尧的《你来,我走》所显示的,肖梅的西方想象,是“从移民公司的‘学习’来的东西”;孙博的《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也提到留学中介的弄虚作假问题。这里的移民公司的“学习”、留学中介的宣传等,实际上类似于消费社会中的“广告”。鲍德里亚指出,“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此:通过他者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而且,“它总是在阅读和解释的过程,在创建过程中,把亲近的人、团体及整个等级社会召唤到一起”。^{[17] p217}就是在这样的构建过程中,广告在播散中,达到了“无意识的诱劝”。^{[18] p15}据此,克拉克总结道,“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19] p23}但广告的预言性话语,并不是依据真相,而是隐匿着诱导性的,歪曲的权力,并在其控制之中,否定真相,也就是鲍德里亚(又译波德里亚)后来在《冷记忆4》中所说的,“由于广告对真相的不断歪曲,人们最终会否定真相本身”。^{[20] p26}这就是“广告”的面目,而其中所表征的“西方”,也将否定与之相关的真相,特别是那些不易觉察,深藏于社会结构之内的危害。

除了广告里的“西方”,还有大众传媒里的“西方”,也具有诱导与遮蔽的功能。当年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就是在传媒世界中发现的。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今日的“地球村”更加微型。但大众传媒,在叙事的选择与过滤中,不仅

无法缓解“面对面”的匮乏,而且更是加剧了“我不在场”的困境,带来了鲍德里亚所言的“就是实际不存在却偏偏存在的事实”,即“幻影”。^{[17] (p17)}可见,在大众传媒中的“西方”,也很难见到真相。

除此之外,有一个历史的语境,哪怕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不能忽视,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东西方语境”。无论是五十年前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还是近年来鲍曼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实际上,都多多少少地忽视了后殖民主义所涉及的一些东西方问题及其权力场域。当然,中国的问题,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与方法,如同鲍德里亚和鲍曼那样,同样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启示。

后殖民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与鲍德里亚所关注的“消费意识形态”以及鲍曼所聚焦的“游客与流浪者”的空间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殊途同归的内在关联,毕竟他们都共同关注、思索“西方”。鲍德里亚指出,消费实质上具有驯化的功能,并肩负着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实现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重任,而其实现的途径就是在无意识的诱导中所呈现的非强制性统一。^{[18] (p9)}在人的生存属性的层面上,鲍曼将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移动,作为“游客”和“流浪者”的分野,将人置放于空间权力场域之内进行考察与审视。^{[21] (p1)}霍米·巴巴认为,存在一种作为殖民者同化手段的文化翻译。生安峰对此的解释是“欧美‘强势’文化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播散开来,将非西方置于一种狭隘的进步论和发展论的叙述之中,将被殖民者视为在与历史约会时总是‘不准时的’、滞后的和迟到的。”^{[22] (p87)}这三个论说将有助于理解与认识我们中国人所身处的“东西方语境”。

霍米·巴巴有关殖民者文化翻译的观点提示我们,自从近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或者在现代性的追逐中,“中弱西强”的“东西方语境”及其权力场域,从来不曾离开过历史的轨道,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消费时代。所以,无论是胡大鹏的“一百年”的落后,还是小留学生家长们“发达”的“差距”,尽管二种表述之间有着世界形势和生存处境的急遽变迁,但“落后的”“矮化的”“不自信的”民族自卑心理是一贯的。但在新历史语境,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中,这个连续的、隐匿的权力,与“半殖民时代”“冷战时代”相比,更加隐性,在其实现途径上,采取迎合和聚焦人性的某些层面,比如鲍德里亚所发现的消费欲、鲍曼所发现的空间移动欲等的实践策略,倾向于无意识诱导和非强制性统一。换一个角度来看,在远离了战火的硝烟、剧烈的对峙之后,“和平”和“发展”稀释了国耻家仇、救亡图存的历史重负,又在全球化的推动与刺激下,消费和空间的欲求成为了人自然存在的内在规定,为满足需求而努力,成了人的生活所在和生存旨归。于是,仿佛一切都是平静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其中就有移民梦、西方梦。

梦境本身是合理的,可加拿大新移民小说所表征的“西方梦”,却是发生在否定与遮蔽真相之中。在蒙蔽状态中一味地追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鲍曼指出“大体而言,消费者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而不是记取。”^{[21] (p79)}正是这个“遗忘”,而且是不为所知的、合理化的,对历史、身份、情感等故土记忆的“遗忘”,将令他们在发现真相的时刻,体验到生存的悲情。此刻,身处消费时尚光晕里的他们,还沉浸在各自眩晕的快感之中,即便他们意识到了可能的消费代价,但也处于广告投资者的困惑里——“我知道有一半丢掉了,但还不知道是哪一半。”或许,当他们找到“哪一半”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了,而有可能向一个生产者蜕变。

五、“新移民文学”与“重返八十年代”

上述所勾勒的“故土创伤——西方诱惑”的小说叙事结构,虽然仅来自“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无论是对我们观照世界华文文学视域下的“新移民文学”,还是审视中国当代文学,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反思价值。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的空间位移、“历史创伤”与“西方憧憬”在追求“现代化”中的时间参差,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吗?纵然“重返八十年代”的目的、方式、群体与场域,或多或少都有所出入,但也侧面烘托出“八十年代”之于当代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以及“重返”之必要性。

这个“八十年代”不仅是历史的片段,也是文学的时段,而“重返”不仅是镜鉴式的,也是审美的、诗学的。在这个意义上,“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历史“统构”性。之所以表述为“统构”,而不是“同构”,是为了强调二者之间的同源与语境差异,但“同源”不是“同属”。“新移民文学”的源点是当代中国的“八十年代”,与新时期文学具有时间的同一性,但终究对离散中的新移民作家而言,“中国”已是回望的故土,与驻守的本土作家相比,特别是在国籍的更改与公民身份变化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文学发生语境有着较大的跨文化差异。对此,刘登翰曾指出,新移民作家“他们从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异国文化,重新回味故国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带有着文化反思性质地对故国人生的描述和对故国文化的解构或重认,也不尽相同于国内作家的书写”。^[23]正是这种文化语境间差异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时候,“新移民文学”无法归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当然由于语言的同质性,与故土难以割舍的时空关联,“新移民文学”又很难归属于所在国的文学系统之中,于是不得不陷入一种边缘的境地之中,但也正是这“边缘的位置”赋予“新移民文学”独特的价值。虽然全面而深入地阐述这种“独特”的意义与价值,非本文所能涵盖,但至少本文通过聚焦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八十年代”已然做了一次尝试,将“故土——西方”、“历史创伤——西方诱惑”之间的时代性、历史

性得以在“边缘的位置”上进行了重新观照,为“重返八十年代”提供了一次“边缘的视角”。

尽管本文选取的文本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隐含作者的离散经验很多时候才开始不久,还难以拉开与本土的距离,但从上述的分析与阐述中,作为读者的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隐藏于文本之中的“边缘”体验,而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八十年代”及其“重返”难免会有一些差异。齐格蒙特·鲍曼,通过开掘西方美术透视画法所蕴含的现代空间意义,提出“空间的组织重点已从‘谁’这个问题转向从‘空间的什么点’这个问题”,并认为“既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占据相同的位置,从而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所有的观察不可能都是等值的。”^[21]或许“八十年代”里的新移民作家与本土作家在“主体”上仍旧有着历史的同一性,但由于“空间的视点”已不再可能重合如一,因而各自所观照的“八十年代”以及“重返”的姿态也将产生不同之处。

虽然“新移民文学”的边缘价值在本文中的理论性大于实践性,且亟须验证,但仍可以呈现出一些问题,以作后续:“新移民文学”的概念如何界定,是否应在文学史的视域中重返“八十年代”,并将其作为文学边界的源点来看待;无论是将“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还是彻底历史化的途径,任何场域之内的“重返”“八十年代”是否已足够周全,是否应考虑涵盖“新移民”的“边缘的视点”;也在这个意义上,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简单的“归属”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 [1]甘 阳.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
- [3]赵庆庆. 枫雨心香: 加拿大华裔作家访谈录(第1辑)[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4]李 彦. 红浮萍[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 [5][法]雅克·勒高夫. 历史与记忆[M]. 方仁杰, 倪复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6][德]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M]. 季 斌, 王立君, 白锡堃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7]张 翎. 雁过藻溪[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8][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译, 曹卫东校.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9][奥地利]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张爱卿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 [10]陈 河. 布偶[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 [11]旷新年. 写在“伤痕文学”边上[A]. 洪子诚, 等. 重返八十年代[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2]阎 真. 曾在天涯[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13][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 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14]李 陀, 查建英. 关于80年代的访谈[A]. 洪子诚, 等. 重返八十年代[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5]程光炜. 一个被重构的“西方”: 从“现代学术西方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J]. 当代文坛, 2007(4): 42-47.
- [16]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17][法]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钢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8]张一兵. 消费意识形态: 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A].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刚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9][英]克拉克. 欲望制造家: 揭开世界广告制作的奥秘[M]. 刘国明, 等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20][法]波德里亚. 冷记忆4[M]. 张新木, 陈凌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21][英]齐格蒙特·鲍曼. 全球化: 人类的后果[M]. 郭国良, 徐建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 2013.
- [22]生安峰.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3]刘登翰.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美华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词[J]. 文学评论, 2007(3): 108-114.

(责任编辑: 刘伏玲)